

保安局在行动



[英] 奈杰尔·韦斯特 著

显 福、陈 锋 译

保 安 局 在 行 动

[英]奈杰尔·韦斯特 著
显 福 陈 锋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八月

MI₅
British Security Service
Operations 1909—1945

保 安 局 在 行 动

〔英〕奈杰尔·韦斯特 著
显 福 陈 锋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 $12\frac{4}{5}$ 字数28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5319·44 定价: 2.30元

出版说明

英国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又名英国保安局，是英国最机密的反间谍机构。该机构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组织、任务和活动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美国斯坦与戴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保安局在行动》一书详细介绍了该机构从一九〇九年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内幕，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双重间谍、女间谍，采取监视、窃听、控制敌侨等方法破获德国谍报网以及对德国进行战略情报欺骗的活动。书中还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六名德国间谍被抓获、处死的经过和英国在许多国家经营双重间谍网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披露。

该书作者奈杰尔·韦斯特在专门报道英国情报界内幕方面小有名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反间谍活动也颇有研究。并且，经常为英国《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撰写有关间谍的文章。作者为了撰写本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英、美、德、苏等国几十名特工人员。该书资料丰富真实，对了解和研究英国保安机构的活动有较好参考价值。

作者在书中对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战和平运动、英共与苏共的关系及苏联战时的活动颇有歪曲不实之词。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作用和效能也作了过分的褒奖。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本书原名《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译时改为现名。

目 录

序言	(1)
第一部分 军事情报局五局1909—1939	(18)
第一章 初创时期	(18)
第二章 军事情报总局和英国共产党	(38)
第三章 德国间谍机构的战争准备	(74)
第二部分 参战	(113)
第四章 外侨：内部的敌人	(113)
第五章 英国的第五纵队	(121)
第六章 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各处简介	(144)
第三部分 战争	(180)
第七章 B处的双料间谍	(180)
第八章 双料间谍网	(219)
第九章 倒霉的十六人：以儆他人	(280)
第十章 伦敦西区国王大街 11 号和 16 号	(317)
第十一章 海外控制处	(329)
第十二章 爱尔兰后门	(360)
跋	(384)

序 言

“给陆军部写信如同对牛弹琴。几乎得不到任何乐趣，
你很可能遭到压制；而且两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无名军事哲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以情报为题材的书籍已出版不少，但极少有谈及英国最重要的反情报机构——保安局。该局一度被称为“帝国保安情报局”，现在则更多地提到它的军事情报序列代号MI 5，即军事情报总局五局。

一九六三年，约翰·布洛克在该局第一任局长的遗孀凯尔夫人的帮助下，写过有关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情况，但关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的情况，他写的还不到七页纸。诚然，该书有一部分叙述了策划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斯卡帕弗洛击沉英国皇家橡树号船事件的那位德国间谍。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间谍。

许多对反情报问题感兴趣的人希望，期待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情报史》一书会更正这一讹传，但情况并非如此。这本书是以欣斯利教授为首的一些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研究撰写的。在长达近五百页的第一卷中，只有十处提到过保安局。而这十处也主要是涉及军事情报总局同英国其他情报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具体谈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本身的活动。

当然，人们对英国最秘密的政府部门知之甚少，这无疑

是情有可原的。它的工作人员不准发表回忆录，在公共档案馆几乎没有收藏可资查考的有关它的文件档案。唯一例外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三年担任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的珀西·西利托爵士在他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自传《密探》中，用了近三十页的篇幅叙述了保安局。

他的第一次尝试大都由他的私人助手拉基尔·李代笔，但政府没有同意发表。一九七二年约翰·马斯特曼爵士发表了《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战争期间的双交叉制》一书，叙述了他主持过的“双十委员会”，这给反情报研究者带来了真正的突破。正如预料的那样，保安局对此提出了抗议，但希恩先生领导的内阁最后还是决定准许它在英国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无疑突破了长期以来施行的禁令，引起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负责处理双料特务具体事宜的一些军官相当大的不满。对于这些双料特务的事情，马斯特曼竟是如此毫无约束地进行描述。结果，这本书成了一本畅销书，它精彩地剖视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一个下属部门的工作内幕。同时，它也导致了其他一些描写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战时活动的小说的出版，其中包括伊万·蒙塔古的《决不是此人》、《埃迪·查普曼正传》和达斯科·波波夫的《间谍反间谍》。在马斯特曼为获得出版许可而四处奔走期间，他征求过B处1科所有办案军官的意见（虽然没有征求过那些特务本人的意见），甚至还有一位军官——克里斯托弗·哈马，他在那长时间的谈判中充当了他的法律代表。

然而，由此产生的保安局的概貌必然是靠不住的。马斯特曼详细地谈到了B处1科，但却从没有提起过B处2科和B处3科，而这两个科都是反间谍B处下属的两个重要部门。同样，他也没有提及A处、C处、D处、E处和F处的工作情

况。

有些评论家还对只提职务而不提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马斯特曼谈到办案军官和B处处长，但是没有告诉读者这些杰出的人物到底姓甚名谁。

“指名道姓”当然有很大的风险，查普曼·平切爾在撒切爾夫人指责他的《他们的职业是叛卖》一书为“不准确的……歪曲的……和颠倒黑白的”时便遇到这种情况。我一直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反复地核查我所得到的材料，避免犯使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失去个性的通病。马斯特曼具有他的有利条件，他可以看到他自己战后写的关于“双十委员会”的报告，并可以根据他亲自参与其中的四年半（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活动，叙述他自己在保安局的经历。我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找到了许多双料特务，听取了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许多退休军官也乐于接受采访。他们也许是希望能把过去的讹传纠正过来。

在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保安局的一位前局长对我说，这项任务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尤其如此。正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激励着我开始了我这一生中最感兴趣的三年。虽然我找到的对我颇有帮助的公开资料寥寥无几，但是我得到了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本人是战时秘密情报局的军官，他在自传中告诫人们说：“在我的经历中，外交人员和情报特务都是骗子。甚至是比新闻记者还要大的骗子。试图根据他们的记载重新撰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在处理一些荒诞离奇的材料。”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把这件事作到底。珀西·西利托爵士的评论鼓励了我：“军事情报总局五局似乎

一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使公众一会儿对它感到好奇，一会儿对它感到愤怒。”我知道，他说的话是事实。他认为“该局广为人知的声望并非夸张”，这个看法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不久，我便发现自己持有同珀西爵士同样的看法。甚至连最近发表的关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文章和书籍也是错误连篇。人们普遍认为菲尔比的《我的静悄悄的战争》一书，至少对英国战时秘密机构的叙述是可靠的，但他也不正确地把“查尔斯·皮特里爵士”说成是“战时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局长”。他指的大概是戴维·皮特里，但实际上，即使是他也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即宣战一年多之后才加入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布伦特泄密”事件中的主要“鼯鼠追踪手”安德鲁·博伊尔，在撒切尔夫人证实这位历史学家有罪六个月后还错误地提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B科”。还有一些人声称，布伦特曾升任“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第三把手”。同样不准确的是，查普曼·平切尔断言说，罗杰·霍利斯起初加入过军事情报总局五局F科”。尽管有许多评论自称“消息灵通”，但没有一个了解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内情的人，指出过那只是些弥天大谎。

其原因简单说来是因为，在局外人中，很少有人了解该组织的机构或它的职责。有些人宣称，保安局的任务仅限于在联合王国疆界内维持国内治安。还有些人把它比作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我列出了战时保安局的组织序列表，这是我这项工作的核心。至今为止，很少有人试图描述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机构，成功者则更少。战时“该知道的就知道”的政策意味着，我得不到什么帮助，特别是得不到那些我推测了解军事

情报总局五局全貌的人的帮助。他们特意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分成为许多部门,这样,处长一级的干部就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其他处的活动情况。这使得我的任务更难以完成,但是在反复核实查证之后,总的轮廓慢慢地展现出来了。

由此列出的组织序列表放在本序言的后面,表内列有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许多杰出的工作人员的名字。

在弄清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职责范围及其内部结构之后,我转而研究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物。与此有关的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军衔问题。例如,盖伊·利德尔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军衔都是皇家炮兵上尉,甚至在他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被提升为B处处长之后仍旧如此。但是,他的许多下级的军衔却比他高。莱恩·伯特原是伦敦警察厅巡长,一九四〇年九月应招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工作,在情报部队服役时的军衔是少校。战争结束时,他晋升至中校。同样,当戴维·皮特里爵士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被任命为保安局局长时,他也被授予“少尉、代理上校、地方军准将”的军衔。在这个组织的内部,军服和肩章无关紧要,许多工作人员穿便衣,很少穿军服。确实,在战后不久的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合,迪克·怀特因为不愿着军装而实际成了报界的一条独特的新闻。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每日电讯报》以“运兵船上有一个神秘人物”为标题报道说:D·G·怀特上校,“一位重要的便衣乘客”,在利物浦登上了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号轮船,前往中东重返部队。“电讯”显然已在等候他抵达各个码头。陆军部无疑有些尴尬,它发表评论说,情报部队的怀特“在外出离队时准许穿便衣旅行。”

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负责同其他单位进行联络的军官授予了本地的军衔,以使他们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合作。派往国

外的国防保安军官尤为如此。然而，正如人们预料的，有些“临时军官、临时先生们”或者是“穿军装的老百姓”缺乏军纪，造成了同正规军人之间的某些摩擦。

知道要把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军衔问题撇开不管后，我立即又遇到了识别前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军官的困难。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立下保证，决不泄露被保安局录用和有关他们的职责的情况，他们从政府得到永远“不披露他们的身份”的承诺，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平凡的经历，在《人物志》这样的参考工具书上榜上有名的大部分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前军官也只好写上“民事助理，陆军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如此简单的介绍和其他通俗的伪装身份。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惯例，即珀西·西利托爵士的条目，上面列有“保安局局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则不得不满足于那千篇一律的“在陆军部工作”的词语。他们不仅要对他们的工作部门保密，还要求严格保住个人机密。男性工作人员宁愿在皮卡迪里街让他们的同进午餐的伴侣下车，而不让他们在圣詹姆斯大街下车，以免暴露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办公地点。他们的亲属被要求不要深究他们在陆军部工作的具体部门，当被问及时，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雇员们总是给予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在陆军部的一个相当枯燥的部门工作。”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未能看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闻名的登记科里的档案，但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设法采访了许多保安局前军官，从而得以编绘出它的组织机构表，查明了该局大约二百名主要人物。我还进一步认识到我所选择的这个题目的神秘色彩。

使我惊异的是，我认识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实际上一

直在积极地提高它自己的威望，经常为渲染它的权利和影响的神话推波助澜。一个例子是：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曾经发过指示，要求它的军官在同诸如警察局长这样的半知情的局外人接触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显露出惊讶的样子。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密码的规定。所有同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总部的通信联络，不管其内容如何平淡，都必须用密码电报拍发。

使保安局具有神秘感的原因是它在英国所处的独特的地位，它是联系文官与军方的桥梁。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虽然在编制上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对陆军部长负责，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可以直接同内政大臣和首相联系。其第一任局长、帝国高等爵士、外科医学学士弗农·凯尔少将爵士同位居政府最高层的那些人——内阁部长、常务次官和各军种参谋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保密电话总机使他可以和秘密情报局长、首都警察局长、海军情报局长和当时的外交部特别顾问取得直接联系。正如《泰晤士报》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登载的他的讣告所说的：“他的名字也许不大为公众所熟悉，但是在官场，很少有人比他更为知名。”情报部门的人员不断变换，正如首相不断换人一样，但是这些职位仍然保留着。白厅的结构有助于象“眼罩”·霍尔海军上将这样的一些情报官僚建立起个人王国。霍尔担任海军情报局长的时间比本世纪任何一任局长的时间都要长；他父亲在上一个世纪创下了同样的纪录。他们俩都曾拥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俩的任期都不及凯尔三十一年任期的五分之一。

如果能够得到所有的文件，又有大约四十年事后认识的有利条件，要描述那时候的各个事件，对研究人员并不是一

件很困难的任务。但是在这个题目上，几乎得不到任何有关的文件，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那些不畏艰险的人去依赖别人的回忆。在听取他们的回忆时，不论其真假如何，必须注意其中的偏见，以及在回顾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件时很自然带有的渲染的色彩。对于保安局，他们自己形成了两个类同的固定不变的看法，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发表相反的意见。

人们最普遍持有的看法也许是所谓的“印度警察”综合症。换句话说，即在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是殖民地警察，这些人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完全跟不上现代情报技术的步伐。对大多数不怀恶意的宣传来说，这种看法确有些道理。保安局在战争期间确曾雇佣过许多前殖民地警官，其中来自印度的远不只是少数几个，但是那些了解印度迷宫式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的人，就不会小看处在阴谋、诡计和混乱之中的印度警察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在现在，那些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还认为，印度次大陆受英国控制的情报系统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报搜集机关的样板。那时，英国几乎在每一个村庄都有消息灵通的情报来源，这话并不是吹牛放炮。被凯尔吸收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都是在这个特殊的系统中有经验的人。

人们普遍持有的第二个看法与下面这一点有关：年迈的弗农·凯尔爵士很不适合领导反间谍组织，而且，客气点说，他的方法离奇古怪。实际上有许多传闻使人们得出了这种看法。一个名叫约翰·莫德的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军官回忆起他同这位局长的一次难忘的谈话。在这之前，他被派往苏格兰去调查一个间谍谣言案，在火车上同一位正要返回部队的青年炮兵军官闲聊了起来。莫德穿着便衣，他听到坐在

他对面的这个人详细地谈论着英国纳尔逊号轮船当时的位置和其他有失检点的事情，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俩越谈越起劲，这位军官的警惕性也越来越松懈。当这位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军官完成了任务返回伦敦时，他向凯尔报告了这件事。凯尔问他是否怂恿那位军官说话不检点。这位后来当了法官的人承认说，他实际上设法将那位年轻人往这方面引。这时凯尔对他说，别再提此事，并警告他今后再也不要这么做。

这种对反间谍近乎慈父般仁爱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指责，说它陈旧过时。但是人们也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评价：从未有人指责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象盖世太保一样，它也从未成为过任何政客或政党的工具。毫无疑问，在同一时期，英国保安局在这一方面肯定要比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同类机构的情况好。法国和荷兰流亡政府都对怀有政治动机的保安机构感到头痛。

最后就行话问题说几句。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象其他的任何组织或机构一样，也发展了它自己的术语，从他们的话语中，很快便可以分辨出谁是局里的人，谁是局外的人。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我为这本书进行的三年研究工作期间，没有一个了解内情的人使用过“间谍”这个词。

在本书中，我有时用“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有时用“保安局”。这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个机构，虽然其他情报机构的人在谈到保安局或秘密情报局时总是简单地把它称作“五局”或“六局”。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从未使用过保安局的缩写名称。

要了解的第一个内部原则是特务和军官的区别。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军官是在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总部或其某一个

下属办公室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办公室”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办公的楼房，它具有更广泛的含义。特务不在办公室上班，而军官却在。特务本人极少到军事情报总局的办公地点去，他们通常只与他们案件有关的军官联系。除了办案军官外，还有其他的军官，但是他们都不能称作为“军事情报总局的特务。”

特务们本身可以分作三种类型。明牌的特务为 X 工作，反对 Y。双料特务是那些向 Y 坦白说他们正为 X 工作，并且改变他们忠于的对象，为 Y 工作去反对 X，“三重特务”是最复杂的。他受雇于 X，并把这一情况向 Y 坦白，希望 Y 因此把他作为双料特务使用，而事实上他仍然忠于 X；X 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收到他提供的情报，那么这些情报都是受 Y 控制的。

经营双料特务这个行当极其困难，J·C·马斯特曼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有一个领域他没有论及，即“转变”的实际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特务改变其忠于的对象的方法问题。强制和野蛮的暴力适得其反，因为特务会装出一副表示愿意合作的样子，但对自己受到的虐待心怀怨恨，一有机会便会再变回去。经验说明，一个优秀的双料特务必须笃信他的新角色。至于这位特务开始时是主动“转变”还是在经过长期的耐心说服后才“转变”的，这个问题并不要紧。一旦转变过来，特务必须让他的办案军官相信，他的转变是真诚的。

错误地把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军官称作为特务，或者是把偶尔为对方做过特务的军官叫做双料特务，已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一旦读者弄通了这些细微的区别，就容易了解军事情报总局五局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复杂的历史了。

我把本书分作三个部分。战前部分专门谈一九三九年前凯尔领导的军事作战局五处或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发展概况。中间部分叙述战争的爆发、凯尔被解职及其有关片断情况。最后一部分详细地谈到双料特务及其特务网，在不列颠抓获和处决的间谍，苏联战时的活动，以及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在海外的活动等情况。关于这一方面，我把爱尔兰也包括在其中。

